

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

吴传清

一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特别是80年代以来陷入了理论“贫困”的危机之中。国内不少学者提出:要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对西方发展经济学进行改造和革新,创建新型发展经济学。特别是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我们认为,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除了要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优秀成果之外,还必须继承和发展我国历代进步思想家的经济发展思想。根据这一思路,本文拟就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实业家、经济思想家穆藕初(1876—1943年)的经济发展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二

鸦片战争的惨败顿使国人痛感中国在各方面都已落后于西方国家:军事落后、科学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而一切落后的根源是经济落后。因此,经济发展问题成了“中国近、现代的根本经济问题”,也成了“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以及“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穆藕初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意义、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解决对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等各方面的问题,内容极为丰富。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意义

穆藕初为中国经济发展规定了两项目标:一是“求富”、“救贫”;二是“图存”、“图强”。

穆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求富”和“救贫”,即采取“积极主义”态度,充分有效地“开发固有之富源”,谋取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藉以改变社会普遍贫困的状况。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土广民众,而日患贫弱”;而另一方面又是“货弃于地”,丰富的经济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同时,经济发展的落后又导致已有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也就是社会民众日趋贫弱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物质胥人类之幸福”,而中国则是“货弃于地”;这样社会民众就失去了幸福的凭依与保证。要改变这种贫弱的状况,就必须振兴实业以发展经济,唯有如此,方能“求富”、“救贫”。

穆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图存”和“图强”,即要通过振兴实业的途径来发展经济,谋求富国之地位以“图存”、“御侮”和“雪耻”。在他看来,对于处在殖民主义时代的近代中国而言,经济发展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危亡的大问题,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整个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各先进国,莫不厉业淬神,厚植元气,以图国力之拓展”,中国处此经济竞争环境之间,只有通过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方能“跻国家于富庶之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国力充实,方可以御侮,可以雪耻”。这种视“富庶”为“图强”、“御侮”前提保证的思想,是穆氏对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实业救国”、“求富自强”思潮的集中表达。

穆藕初一再强调经济发展对于解决近代

中国所面临的“图存”、“图强”问题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一, 经济发展可以避免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商品市场。中国“富藏无量, 为全球视线所集注, 大势所趋, 非深闭固拒可了事”。在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已使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时代, 中国不可能再实行闭关自守的消极防卫政策, 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在穆氏看来, 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扩张的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经济资源和拓展商品市场, 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吾自海通以来, 与外接触, 步步退后, 至近年益形窘迫。”在此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 只有积极地致力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才是中国的唯一抉择, 中国必须“力求善处之道”, 充分地开发利用本国的经济资源, “发愤为雄”, 谋求国家的富强。否则, 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任西方资本主义宰割的原料、商品市场。如果中国背逆历史的潮流而不能作出积极的反应, 那么必将吞食这样的苦果: “我不自为, 人始代谋, 贬主为奴”⁴⁰; “我不自谋而后人始代谋, 东方大陆上水深火热之后患, 正不堪设想”⁴¹。

第二, 经济发展可以避免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弱肉强食是殖民主义的本质特征。穆氏通过对埃及、印度等国亡国根源的审视, 他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 还关系到国家最终是否会沦为完全的殖民地或附属国, 所谓“实业关系国家之兴替存亡”⁴²。他指出: “如波斯、埃及、印度、高丽等国, 无企图实业之计划, 无发展实业之能力, 而今皆受强邻肢解吞没”⁴³。因此, 处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落后国家, 就必须通过振兴实业来发展本国的国民经济, 富国裕民, 唯有如此, 才能避免亡国的命运。穆氏的这一思想揭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避免殖民奴役的根本出路在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

第三, 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 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穆氏认为, 一

个国家的兴盛, 并不是通过单纯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就可以实现, 而是要通过经济发展的整合作用推动社会秩序结构的良性变迁和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重构再建来实现。穆氏从社会现实出发, 洞察到了他所处时代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二元状态所导致的矛盾冲突, 并把自己所处的时代明确称为“过渡时代”⁴⁴或“过渡时期”⁴⁵。他认为, 在“过渡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的纷乱状态: “自通商以来, 道德堕落, 廉耻丧尽, 相习成风”⁴⁶; “狂妄者流, 相与倒行逆施, 为所欲为各个性之劣点, 不以尽情暴露不止”; “政治紊乱如彼, ……新道德藩篱早破, 一般泉境之众, 如脱牢之囚犯, 如出柙之虎兕, 无羁勒, 狂奔怒笑, 一任个性之发泄”⁴⁷。如果不消除这种社会秩序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混乱无序状况, 中国将无法兴盛、富强, 只会在矛盾冲突的纷乱中自戕。而要加快过渡时期的社会转型, 就必须重视经济的发展, 即通过经济的发展来推动新型社会秩序结构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故欲扶人民之道, 非竭力振兴实业不为功”⁴⁸。如果经济发展停滞、凋敝, 必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因实业之不振, 而国民生产力低落, 而国民之道德心遂枯亡, 循此以往, 不急急焉补救之, 其不沦为原民者几希矣”⁴⁹。

(二) 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及解决对策

穆藕初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可能性持十分乐观的态度,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 一是中国有“天赐之地利”, 土地膏腴, 物产丰饶, “为全球各国所惊羨”, 仅就地利而言, “我国人果能利用之, 已足致富强”; 二是中国拥有大量“价值低廉”、“天资又不弱”的劳动力, “稍经训练, 即成良工”, “即使无他凭籍, 仅此四万万数千千万人之腕力, 善于使用之, 可以创造新世界”⁵⁰。在穆氏看来, 发展中国经济的经济要素条件是具备的, 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是充足的。然而近代中国经济却未能得以良性的发展, 这就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问题。穆氏认为下列主

要因素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一, 国内政局的混乱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近代以降, 政争不息, 战乱不止, 混乱的政局直接破坏了经济的发展。“国势所以至此, 端由实业不振”, 而实业不振又得“归咎于军阀武人养兵自卫, 攘地扰民, 尽箕豆相煎之能, 成南北分裂之局, 钩心斗角, 召乱滋纷, 只便私图, 罔顾大体”⁴¹。政治、军事上的混乱在任何时候都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都会导致经济的停滞。这种阻碍首先表现在政局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兵祸连年, 扩张权势者流, 日事招募”, 致使“生产之农变而为消耗国力之兵士”, 不断加剧“农事废弛”, “产额遂减”⁴², 农产品价格不稳, 水利失修等。其次表现在“政府不加保护”、“蠹吏剥蚀”以及“武人搜刮”⁴³的不良政治环境直接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政治不良”在经济上的直接集中表现必然是商业秩序的混乱、商业资本的腐败。这种恶性的商业环境导致了近代商业的萧条和“不振”。中国商人即使有“异常天才”, “亦不能战胜政治不良所发生之阻力”⁴⁴。“政治不良”还导致了商业道德的沦丧。“第自革政以来, 商业道德日就沦丧, 其殆受恶政治影响使然”, “年来政争不息, 祸乱相寻, 教化不修, 商业道德日见堕落”⁴⁵。

第二, 落后的、不合理的国际国内税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曾在海关任职的经历使穆氏对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协定关税这一不合理的税制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体察: “我国与各国通商条约之误点, 实由于当事者不明税法原理。……抛弃固定税之权利, 而受协定税之拘束, 数十年来, 吾全国人民所受敲骨吸髓之痛苦, 实自此类条约始”⁴⁶。协定关税, 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而且还严重束缚和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穆氏对国内落后的税制也予以了激烈的抨击: “我国工商业不振之最大原因在厘金, 国民深受其累”⁴⁷; “横征暴敛, 罔邱民艰, 土货之税, 重于洋货, 甚至局员多方挑剔, 关卡节节留难”⁴⁸。此种“苛税累加之痛苦”致使“百货停滞, 群商束手”⁴⁹, 严

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穆氏此处所言之“厘金”, 是晚清政府为了其政治、军事上的利益需要而征收的一种流通税, 此税一方面大大限制了商品流通, 加重了商品成本, 另一方面又大大影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 这种落后的税制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穆氏在此初步地认识到代表本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家利益的国内外税制的“横征暴敛”是导致社会资本积累不足、收入水平低下的关键所在。

第三, 交通设施的落后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交通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效应。在穆氏看来, “商业之荣枯, 系于交通之便否”, “其他凡百事业发达之日, 固莫不因振兴商业之故, 而共沐交通之赐也”⁵⁰。他认为中国交通业的极端落后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交通事业不发达”可“足以致国家于贫困”。他认为“转输之不便”和“运费又多耗”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商品交换的进行, 致使“偏僻省分, 虽有绝好之食用产品, 除当地人民消费外, 莫之奈何, 而任其陈腐者有之; 工业上需要之材料, 除合于当地人民消费外, 莫之奈何, 而视同废物者有之。合全国产额计, 每岁因交通不便利, 故不知无形中损失若干兆金钱也”⁵¹。

第四, 企业管理的落后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穆氏是中国近代引进和实践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 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无管理方术”, “吾国实业之失败, 关于管理法者”。在他看来, 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的弊端表现在: 第一, 企业之总经理等要职, 往往为“社会名流”把持, 他们既不懂业务, 又懒于研究, 使企业失去了正确的指挥; 第二, 讲究封建衙门式排场, 任意安插亲戚故旧, 机构重复而办事反无有用之人; 第三, 对工人一味苛刻, 使之对生产毫无兴趣, 生产效率因而极低⁵²。封建性的管理制度严重遏制了企业活力的发挥, 制约了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穆氏在此揭示了封建主义余毒从企业内部给近代民族工商业所带来的损伤。

第五, 人才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穆氏非常强调人才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认为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人才为事业之灵魂”⁴³, “凡百事业之成功, 全视人才之优劣”⁴⁴。他从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人力资源的匮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是实业人才的稀缺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详考我国二十年来, 累办新业而累招失败之最大原因, 莫不以缺乏实业人才故, 致得不良之结果”。穆氏所谓“实业人才”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科学人才”或“技术家”, 即技术专门人才, 另一类是“管理人才”, 即具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企业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缺乏实业人才这种资源, 是因为教育落后。“吾国实业人才之缺乏, 因平素不知所以发育而储备之, 究原竟委, 当归咎于教育之不修”⁴⁵, 并称“教育最重要之点, 可分之甲乙两种, 甲为道德教育, 乙为科学教育, 完全受此两种教育, 实业界中坚人物, 遂由此产生”⁴⁶。二是国人工商知识的缺乏也严重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是不同的,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生产力最富于特征的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人的素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穆氏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点出发, 认为中国人口数量虽然很多, 但其素质普遍偏低, 大多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安分之民”或“废人”⁴⁷, 无法适应实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实业进行滞缓之因”就在于国人普遍“缺乏工商知识”⁴⁸。因此, 他把“秩序规定力”、“推论力”、“观察力”和“判断力”⁴⁹等视为人的素质的基本内容, 并认为这几种能力的形成, 也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

为了克服上述制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和促进中国经济的良性运作与持续发展, 穆藕初提出应采取下列措施:

第一, 加强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利用国家力量来维护和促进经济发展。在农业方面, 国家应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进行积极引导; 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和粮食的产销进行统筹规划; 对粮价进

行行政监控。在工商业发展方面, 国家应改革落后的、不合理的税收制度, 从保护贸易角度出发, 按照国际惯例, 以平等原则修订我国关税条例以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通过加征进口税的办法废除厘金税制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第二, 加强交通事业的改善和发展, 为经济发展提供交通支持。具体的对策有: 采取以工代赈之法, 投入人力物力修筑马路、疏通河道、铺设铁轨; 改善路政管理, 制定便利运输的政策; 组建“航业公司”拓展海外航线, 积极发展国际贸易。

第三, 加强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 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具体的办法有: 由政府出资创建大型国家银行, 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援助; 由民众出资或集资创建民间商业银行, 为中小型民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创办交易所, 以促进民族企业之间的经济交流和防止市场投机行为。

第四, 改革封建衙门式的经营管理制度, 创建以西方泰罗制为蓝本并融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制度, 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从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其主要内容有: 建立总经理负责制的生产指挥系统; 建立科学严格的用人制度; 建立严格科学的职工培训制度; 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建立灵活的营销管理制度等等。

第五, 大力兴办职业教育, 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 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具体的途径: 一是通过技术传授和文化普及, 提高商人、农民和技工的知识素质; 二是通过经济类专业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 培养造就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科技和管理人才。

(三) 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从世界范围而言, 近代以后的经济发展大都与近代工业的产生、成长表现为同一过程。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迅猛发展都是以工业的巨大发展为显著特征。工业化成为了近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 工业化的过程也

表现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由于具体国情的不同,并不是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部门发展优先次序的选择上,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地把工业放在首要地位。这种差异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穆氏虽然十分称赞西方的工业化模式,但在论及中国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时,他认为占首要地位的应是农业。他说,中国千百年来都是号称“以农立国”,“无农即无工商,无农工商,即无生利之途,而国无与立”。“故立国之道,首在务农”⁴⁰;“立国大计,固莫善于重农”⁴¹。“在诸般实业中,占中心优势者,莫如农”⁴²。穆氏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体察:

第一,从人类的生存要素来看,农业可为人类的生存需要提供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立国之要点在民生,人民生活必须品大都产之于农”⁴³。农业能够提供超过它的自身需要的剩余,能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资料,它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且也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自古以来就流传有所谓“民以食为天”、“仓廩实而知礼节”的古训,“足食则民生遂,教化行,礼义廉耻四维乃张,粮食之关系有如此”,因此,“古来善治国者,莫不以足食为先务”⁴⁴。穆氏把农业与立国之要的民生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无疑是正确的。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农产品的边际产出率极低。要解决国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问题,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边际产出。没有农业发展这一前提,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从发展工业的需求来看,农业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穆氏强调:“工业中所重要者,厥惟原料”⁴⁵。“工业之命脉在原料,原料之足否,工业之隆替系之。苟国内原料充足,无须仰给外人,则成本轻,脱售易,营业因之而畅旺,反是,未有不败者”⁴⁶。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部门必需的原料主要来自农业,从生产的顺序来看是“产之于农”,“成之于工”,⁴⁷工业是“增高农

产品之代价”⁴⁸。因此,农业应该优先得到迅速发展,否则,工业就将成为无米之炊,根本谈不上发展。

第三,从资源优势来看,我国“地大物博”,⁴⁹“拥有绝大膏腴之地”,“物产丰饶”⁵⁰。但这种丰富的农业资源却没有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穆氏认为中国农业的状况与中国农业国的地位和农业资源的优势很不相称,“我国虽以农立国,于农学素不讲求,地力日竭,农民生活日艰,俭于培肥,致产额有缩而无伸”⁵¹。“熟田日削,荒冢日多,而害虫巢穴亦日增”⁵²。穆氏认为科技落后是导致中国农业衰退和落后的最主要根源,因此,必须“因地制宜”,“采用科学方法”以“改良农作”,把农业生产的发展置于运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增多产额,藉裕民生”。穆氏乐观地认为,只要充分地开发利用中国农业资源,必将大大地提高社会的物质福利,“苟治理有道,游食之民,重归于农,生谷之地,以次垦殖,即仅地利言,我国人果能利用之,已足以致富强”⁵³。

穆藕初把农业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首要位置的思想,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也不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农本”思想。传统“重农”思想把农业看作是孤立的,是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相矛盾的生产部门,重农常常是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否定为代价。近代思想家如张之洞、严复、张謇等人的“农本”思想,仅仅只是把农业看作是向工业提供原料的基础部门,即所谓“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本,则工商无所施,商无可运”⁵⁴。传统的“重农”主张与近代的“农本”之说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在穆氏看来,近代要发展的农业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种特殊的产业部门,是带有一定的企业性质的商品生产者。他认为,农业的发展与其他部门(诸如教育、科技、交通、制造业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按农业通例,收成之丰歉,视乎乡民之智识程度而定。故善谋国是者,使教育普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利息减轻,更求产额增多,物品进步,农业

直接受其益”。⁵⁵ 农业的优先发展并非是一种片面的发展，而是要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相协调、共同发展，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部门的发展。“故善谋国是者，必自安民始，调剂金融以通气；开辟交通以畅其流；减轻税率以发展国内之制造；讲求科学以增强农产之资源”。⁵⁶ 穆氏的优先发展农业的思想实际上已包含了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系统发展的内涵。穆氏对农业发展的“安民”、“民生”等时代涵意以及对农业的商品生产者性质的理解与认定，使他的优先发展农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以后，就不再仅仅只是强调某一部门优先发展的命题，而是成了一个有着内在系统规定的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中，每一部分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其他部分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因此，虽然在局部均衡的意义上可以特别着重强调某一个方面或部分，但从全局而言不会出现那种非模式化的单一主张所导致的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内在联系的忽视和割裂。

三

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比较充分和集中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 10~20 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鸦片战争以来进步思想家的经济发展思想，而且还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经济发展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穆氏的经济发展思想既表现出一个具有深厚儒家文化根基的中国人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切体认，也表现出一个受过西方经济学熏染的中国人以一种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以一种融通中西文化的平常心态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科学审察。前者使穆氏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较多地着眼于民族救亡和堵塞漏卮，使其经济发展思想呈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后者使穆氏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以及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角度客观、科学地审视了中国经济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避免了民族主义极易导致的狭隘性和保守性，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应选择的模式和所应采取的战略或策略等问题提出了一

系列具有规律性的独到见解。

穆氏经济发展思想中的不少内容，是可以与现代发展经济学加以衔接的。穆氏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验事实出发，得出了一些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内容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其经济发展思想与现代发展经济学存在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如穆氏认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求富”和“救贫”与现代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涵意就是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充分有效地利用来增加社会的财富以解决落后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穆氏对“过渡时期”政治、文化道德上的二元状态分析与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分析模式、穆氏对人才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与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的基本思想都极为相似。因此，研究穆氏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于我们总结中国经济发展思想这一份文化遗产以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 赵 靖：《孙中山与中国发展之路》，载《经济学家》，1995（2），17~18页。
10 11 12 13 14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5 36 37 38 39 40 41 43 44 45 46 47
48 50 57 52 53 55 《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
25、78、78、25、81、63、25、81、25、117、
117、8、119、9、157、130、49、176、32、12、
55、114、101、54、50、101、122、122、160、
161、131、170、49、129、162、28、49、161、
9、129、129、9、133、131、5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15 16 17 33 42 49 《藕初五十自述》，14、15、18、
15、83、14、4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18 56 《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下卷，3、131页，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34 穆藕初：《中国棉业发达史》，原载《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5号，转引自钟祥财：《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15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54 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新城王氏刊本，卷五四。

（责任编辑：曾国安）